

管子

——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

陈永汉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F462/17

责任编辑 孟昭宇
版式设计 徐乃雅
责任校对 郭虹生 贾全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陈永汉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9

ISBN 7-80118-846-2

I. 管… II. 陈… III. 管仲—经济思想—研究 IV. F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511 号

管 子
——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
陈永汉 著

出版: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 100035)

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29.25 印张 726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118-846-2/F·804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 100836)

序

孟昭宇

经济管理是一门科学，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方面；简言之，即运用经济手段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调节、监督和指挥。经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在经济领域，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言而喻，我们的经济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也应具有中国特色。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6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末，即从中国的明代万历至清代嘉庆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初期，特别是1840年以后，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在落后的国民经济环境中，不可能磨练出完善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但是，建立起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管理模式，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究竟应当具备哪些要点，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同时又不与时代潮流相违背。种种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探讨、去解决。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模式，其主要依据应当

是什么呢？当然应当是当代我国经济领域的现实状况，亦即我们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摆脱中国的传统文化，扬弃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中有关经济管理的精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之树，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花繁叶茂。近些年来，我国企业界人士和学术界专家在探讨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模式时，以总结现实经验为主，既注意了吸收、消化外国的行之有效的作法，同时也注意了发掘和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从古代思想宝库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用以改进和完善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早在公元前六百余年的春秋时期，中国就曾经出现了像管仲那样的一位经济管理学家，总结他的经济管理思想的《管子》称得上是一部“奇书”。《管子》一书中的经济内容，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实践的总结。《管子》中的经济内容，概括说来就是“通货积财”；而其所取得的成效，则是“富国强兵”。管仲就是以他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

经济管理出版社决定出版《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一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的古代文化，蕴蓄着无尽的珍稀瑰宝；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它们是可以被发掘出来为现实所利用的。想问题，做学问，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一木不能支大厦，众人拾柴火焰高。陈永汉先生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写出了这本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凡是肯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孜孜以求、耕耘不辍的人，都是我们应该支持和给予肯定评价的。

目 录

一、前言 (1)

二、管子与《管子》 (17)

三、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 (27)

1. 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29)
2. 仓廩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 (43)
3. 唯令是视 壹断于法 (53)
4. 施政治事 人民为本 (66)
5. 治官化民 其要在上 身教为重 (78)
6. 明于“计数” 精微细致 (86)
7. 经济观点举要 (95)
8. 轻重十六篇 (107)

四、《管子》简注及大意解说 (121)

- 牧民第一 (123)
形势第二 (133)
权修第三 (142)
立政第四 (155)

- 乘马第五 (171)
七法第六 (186)
版法第七 (199)
幼官第八 (略) (202)
幼官图第九 (略) (202)
五辅第十 (203)
宙合第十一 (215)
枢言第十二 (238)
八观第十三 (255)
法禁第十四 (268)
重令第十五 (274)
法法第十六 (283)
兵法第十七 (307)
大匡第十八 (317)
中匡第十九 (340)
小匡第二十 (略) (346)
王言第二十一 (原文佚亡) (346)
霸形第二十二 (347)
霸言第二十三 (356)
问第二十四 (371)
谋失第二十五 (原文佚亡) (374)
戒第二十六 (374)
地图第二十七 (388)
参患第二十八 (391)
制分第二十九 (396)
君臣上第三十 (401)
君臣下第三十一 (417)
小称第三十二 (434)

- 四称第三十三 (440)
正言第三十四 (原文佚亡) (445)
侈靡第三十五 (445)
心术上第三十六 (479)
心术下第三十七 (490)
白心第三十八 (496)
水地第三十九 (510)
四时第四十 (519)
五行第四十一 (略) (526)
势第四十二 (526)
正第四十三 (532)
九变第四十四 (535)
任法第四十五 (537)
明法第四十六 (549)
正世第四十七 (553)
治国第四十八 (559)
内业第四十九 (564)
封禅第五十 (577)
小问第五十一 (580)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597)
禁藏第五十三 (608)
入国第五十四 (621)
九守第五十五 (625)
桓公问第五十六 (629)
度地第五十七 (631)
地员第五十八 (643)
弟子职第五十九 (644)
言昭第六十 (原文佚亡) (647)

- 修身第六十一（原文佚亡）（647）
问霸第六十二（原文佚亡）（647）
牧民解第六十三（原文佚亡）（647）
形势解第六十四（648）
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690）
版法解第六十六（696）
明法解第六十七（712）
巨乘马第六十八（738）
乘马数第六十九（742）
问乘马第七十（原文佚亡）（747）
事语第七十一（747）
海王第七十二（751）
国蓄第七十三（755）
山国轨第七十四（767）
山权数第七十五（776）
山至数第七十六（789）
地数第七十七（807）
揆度第七十八（816）
国准第七十九（833）
轻重甲第八十（836）
轻重乙第八十一（863）
轻重丙第八十二（原文佚亡）（881）
轻重丁第八十三（881）
轻重戊第八十四（906）
轻重己第八十五（917）
轻重庚第八十六（原文佚亡）（923）
编辑后记（924）

一
绪
言

人类社会是由猿群转变而来的，但猿群不能被称作人类社会，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之上。只有制造和利用工具，进行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才是生产劳动。只有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按照各种生产中的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总体，才能被称之为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产生，大约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人们既然群居在一起，共同从事生产劳动，相互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种种关系，例如协作、分工、交换、分配等等。只懂得如何从事生产劳动而不懂得如何处理相互关系，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为着更有成效地进行生产劳动，把生产劳动组织协调得更加适当合理，处理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即经济管理。一部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发展史，亦即是一部经济管理发展史。经济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劳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同步的，从开始有生产劳动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经济管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现代人类的生产劳动是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社会经历漫长岁月，逐步发展演变而成的；因此，经济管理同样也是由低级到高级，由只具雏形到系统完整，逐步向前发展演变着的。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劳动水平极低，谈不上有什么经验、高超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存在决定意识。在生产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不可能有系统完整的管理。反过来说，人类的生产劳动既已发展到了现代那样高的水平，也就必须有系统完善的管理与之相适应。没有系统完善的良好管理与之相适应，生产劳动就不可能和谐顺畅地继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人无论是在生产劳动的哪一个领域，例如生产工具、劳动技能、科学文化等等，与人类的其他部分相比较，都不是处于落后地位，而是处于较先进的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欧美各国，自从14世纪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到18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中期，即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既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在16世纪和17世纪（明代至清初），虽然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包括列强的野蛮入侵和残酷掠夺，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约150年间，中国的国民经济确实实地是大大的落后了。在落后的国民经济的客观现实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完善而先进的经济管理体系。

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经济，由于承受着已历时两千余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桎梏的制约，长期处于破产状态，全国人民吃不饱肚子。就工业经济而论，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企业，不但钢铁、机械、汽车、石油等主要依赖进口，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纺织、医药、文化用品，连香烟、糖果也都大不如人。商店里最为耀眼动人的全是“洋货”。“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解放前），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曾有过中国人撰著的经济管理方面的著作。在旧中国，曾经有过那样的著作吗？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之日开始，在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我国的经济管理方才被提高到了应有地位，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济管理方面涌现出了不少杰出人物（包括决策者和学者、专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

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的经济管理体系，直到目前，仍然远不能说已经是系统的、是完善的。这主要表现在，从纵的方面看，许多经济管理方面的办法和措施，时刻都处于变动之中，即所谓摸索前进。昨天所贯彻执行的，今天便不再采用了，甚至是被否定了，而明天怎么办则还得重新摸索，很不稳定（不定型）。从横的方面看，全国各行各业，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各有不同办法，某些“先进经验”虽经大力推广也仍然普及不到全国（不一致）。这种“不定型”和“不一致”实际上是反映出了我国的经济管理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还不够成熟。

众所周知，在从1954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在管理方面，我们主要采用苏联模式。新中国诞生后，遭到了西方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嫉恨、仇视乃至封锁。当时，前苏联和新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中国人采用苏联模式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经济建设，从实际出发，也促使我们不得不采用苏联模式。就拿计划经济来说，在建国初期的那样的条件下，如果不采用计划经济模式，又能怎么样呢？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新中国建国后的50年中，在经济管理领域，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和失误，有教训，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重大代价；在挫折和失误中，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应更多地去谈论过去，而是应主要着眼于当前和未来。时代前进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事过境迁。已有的经验不能用了，或者说是不够用了。那么，当前应当怎么办？今后应当怎么办？全盘照搬当代西方各经济发达国家的作法，也许是出路之一。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逾淮北而为枳；江南稻多于麦，江北则麦盛于稻。所以然者，气候水土不同之故也。草木尚且如此，何况是经济管理？不但是长期生活在国

内的中国人，即使是终生生活于国外的华侨和外籍华人，某些外国专家和有识之士，连他们也建议中国搞经济建设不要照搬外国的经验。中国的国情和外国的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许多在国外行之有效的办法，到了中国却未必能够行得通。

于是，有人提出，希望能够建设成一套完善的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体系。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不是任何别的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也应具有“中国特色”。所谓“有中国特色”，从一定的角度看，是一种新的提法，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既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难道中国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具有“中国特色”，却反而应当具有其他什么特色吗？纵观当今的人类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幅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画图。就经济管理而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普遍现象，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大家都在搞有各自特色的经济建设，大家的经济管理体系也都具有各自的特色。

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体系，它的时限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在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在最近约 150 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民经济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但是，在此以前，中国并不落后。难道在漫长的数千年里，中国人只懂得生产劳动而不懂得经营管理吗？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对政治起决定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生活相对美满幸福的时期，例如西汉的“文景之世”、唐代的“贞观之治”，乃至清初的“康乾时期”，都是经济因素促成的。商初的伊尹、越国的范蠡、秦国的商鞅、李斯，西汉的桑弘羊、三国时期的曹操、唐代的刘晏、北宋的王安石，乃至明代晚期的张居正等，他们既是政治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管理学

家。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复杂，便开始产生各式各样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例如坊市制与井田制（古代）、初税亩（春秋）、榷估（春秋至汉）、屯田（汉）、占田法（西晋）、均田制（北魏）、租庸调与两税法（唐）、盐引、茶引与均输、平准、常平、青苗、市易（宋）以及一条鞭法（明）、改土归流（明、清）、摊丁入地（清）等等，全都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内容。在某次经济管理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早期的古代著作中，在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中，是否也有过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较为集中的和较为系统的论述呢？于是，人们想起了管子和《管子》。

中国的奴隶社会，如果从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王朝算起，发展到周平王由镐京东迁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年），已经历了 1300 余年。在这 1300 余年中，社会进步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奴隶制）不再适应先进的生产力的需要，于是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从而在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局面。管子（管仲）是春秋时人，在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众多流派中，其学术思想属于法家范畴。诚如《易·大传》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是，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差异毕竟是明显而深刻的。

就拿儒家的创始人孔丘来说吧！他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丘说：“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孔丘说：“吾不如老圃。”当樊迟离开以后，孔丘嘲讽学生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孔丘看来，统治者只须好礼、好义、好信就行了，种庄稼一类的事情是用不着去管它的，指斥樊须是“小人”。孔丘对于军事，同样是采取藐视轻忽的态度。卫灵公同孔丘谈话，当提及列阵作战时，孔丘便说：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便动身离开卫国往别处去了。号称“亚圣”的孟轲，其著作《孟子》开头的第一章第一句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简直把“利”视为洪水猛兽。

管子的思想则与儒家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恰好相反。在管子看来，“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一整部《管子》，既谈稼圃也谈军事，“利”则随处可见，遍布全书。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就学术思想而论，孔丘与管仲泾渭分明，并曾指责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说他“不俭”；指责管仲“邦君树塞门，管仲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说他“不知礼”。但与此同时，孔丘却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还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者，夷狄之俗也。）对管仲的一生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旧时，人们历来很重视孔丘对管仲的上述评价，几乎成了一种“定论”。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管仲确实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人。

千百年来，管仲和他的著作《管子》，备受人们的尊重。著名的宋代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不但其所推行的新政，如青苗、均输、市易等法，很明显地都是来源于《管子》，即如他的语言，“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益衰坏，患在不知法度”；“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几乎也与管子的某些语言如出一辙。

早于王安石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可以算得是管子的崇拜者。当诸葛亮尚隐居隆中躬耕陇亩时，就常常把自己比拟为管仲。刘